

本期聚焦

追寻“一代文宗”杨升庵的文化星光

——2023年“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郑千山 文图

7月2至3日在昆明召开的2023年“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云南第一次召开的有关杨升庵研究的一次盛会，这次由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联合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大理大学以及昆明学院、保山学院的文学院或人文学院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四川省杨慎研究会、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云南省社科联、北京语言大学、湘潭大学、云南中华文化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可谓盛况空前，亮点频出。

生活在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人称“杨状元”的杨升庵，一生坎坷，几度浮沉，但因“大礼议”事件导致的流放云南，却因祸得福，最终成就了“一代文宗”。在中国古代，谪戍文化是一种独特而“教外别传”的人文风景，几乎所有成为“文宗”或文化泰斗的人和事，或多或少都与谪戍有关，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东坡、滕子京、朱熹、王阳明……无不如此。“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其实为谪戍文化点亮了“龙胆”——它就是深系于一代代古代文人士子身上的“忧乐”观！

在谪戍文化中放出最耀眼光芒的古代文人的代表首推苏东坡与杨升庵。对于前者，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蔚为大观，而对于后者，我们的关注和研究则远远不够，到目前为止，我们甚至还找不到一部点校精良、可信度高的《杨升庵全集》，虽然对于杨升庵的研究来说，近年来已取得不了小的成就，比如搜罗不全但毕竟面世的各种版本《升庵全书》，王才才的《杨慎学谱》、倪宗新的《杨升庵年谱》、张德全的《杨慎传》等也颇受学界好评，杨升庵故乡四川新都成立了省级的杨升庵研究会，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雷磊主持整理、编校的《杨升庵全集》已基本完成有望在近年出版……但对于著作宏富、成就多元、令人高山仰止



研讨杨升庵

的“一代文宗”来说，这些工作和成就就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三迤大地是成就“一代文宗”杨升庵的文化宝地，没有到云南的千里谪戍，就不会有如今面貌的“杨状元”。让人遗憾的是，云南虽也不乏单项或零星的杨升庵选集或评传、研究文章，但零零落落，不成气候，作为升庵故居的昆明升庵祠，其展览形式与内容居然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著名杨升庵研究前辈陆复初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步整理和内部印刷的一套《杨升庵全集》，居然被人借故全版销毁了。到目前为止，云南没有一家杨升庵研究学术团体，杨升庵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是远远达不到“德位相配”的地步的。

令人欣喜的是这次应运而生的“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散发出的是一种对“一代文宗”研究和弘杨的新气象。2日的研讨会上，云南大学林超民教授以《人在天涯 忘却天涯——杨升庵的不幸与云南的大幸》为题，讲述了杨升庵在云南流放岁月履迹中投掷出的增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意义，他引用李一氓先生的话说：“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融化，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云南中华文化学院陈友康教授从写韵楼咏杨升庵诗中得出“名贤遗迹对人有显著的感受、净化和升华作用”；湘潭大学雷磊教授以升庵的张含诗歌批评为中心，对明代学杜（甫）诗歌的“夺胎换骨”法进行分析，颇有见地；云南大学成联方教授陈述了杨升庵谪戍云南时期的碑帖学研究成果；黄淮学院王耿《火把节来源考：基于对杨慎诗歌的考察》从《礼记》等各种典籍和记录中对比、分析认为，杨升庵认为的火把节即星回节是正确的；陈庆江、高云翔与杨园分别以《徐霞客滇游追寻杨升庵踪迹考》《升庵诗中的“滇海”地理意象探析》以及《杨慎的<文心雕龙>之学》为题，展开了杨升庵研究的多维研究领域的阐述……主旨发言交流中，昆明学院姜晓霞、保山学院吴臣辉、大理大学杨增良、丽江师专杨林军、昆明理工大学欧阳聪权、云南民族大学茶志高、西南林业大学李国新等

《魁阁时代》：关于专业、人格、国家的“三观”表达

张英 方冠男

中国式现代化？剧中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也是萦绕在剧中学者、更是今日学者心中的重要问题。

当这样的命题在剧中被提出、被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清楚——话剧《魁阁时代》不仅仅是在演一段关于魁阁学人的故事，其内涵更是指向了深刻的社会学精神，昭示着中国社会学的专业学科建设的根基及其根本追求：从实践调研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现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赜中国发展的道路。

二

当《魁阁时代》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长区间表现出了上述追求的时候，学术的精神便如河流一般自然地流淌出来了。当时，所有在场的观众，只要他心敬畏无涯的学海和学问的殿堂，便一定会心头温烫、眼含热泪，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情感叫“陶冶”。与此同时，这种“陶冶”不仅作用于观众，更作用于参加扮演的演员——当表演者走上舞台，进入规定情境，他们似乎完成了与前辈圣哲的人格组接，人格向度的组接会带来行为向度的影响，于是《魁阁时代》“陶冶”的持久性尤为显著，具体体现为：

一、对于社会学人群的人格培养。从《魁阁时代》这一剧本来讲，它的存在理由是社会学，因其本身就是一部社会学人创作给社会学的情书；通过“乡土中国”这一词汇作为贯穿理念，虽以费孝通为核心人物，展示的却是中国社会学建设内生性的驱动力。从这个维度来看，当社会学人群面对这一戏剧文本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剧中那些脚踏实地地沉着、针锋相对的辩难、不忘根本的良知和面向未来的情怀，他们人格深处的责任感被自然而然地唤醒，一种人格意义上的共鸣随之产生。这既作用于观众，更作用于创作者。《魁阁时代》的剧组人员几经迭代，其中每一次迭代，都像是一种学术人格的传承——传承的最初来源，是费孝通、陶云达等学人前辈，而传承的未来，则如浩渺河川，连绵不绝……就在这样的代代相继中，一段属于社会学历史和寓言被反复书写和强化，最终，会沉淀在这门学科的人格深处。

二、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启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意义，他引用李一氓先生的话说：“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融化，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云南中华文化学院陈友康教授从写韵楼咏杨升庵诗中得出“名贤遗迹对人有显著的感受、净化和升华作用”；湘潭大学雷磊教授以升庵的张含诗歌批评为中心，对明代学杜（甫）诗歌的“夺胎换骨”法进行分析，颇有见地；云南大学成联方教授陈述了杨升庵谪戍云南时期的碑帖学研究成果；黄淮学院王耿《火把节来源考：基于对杨慎诗歌的考察》从《礼记》等各种典籍和记录中对比、分析认为，杨升庵认为的火把节即星回节是正确的；陈庆江、高云翔与杨园分别以《徐霞客滇游追寻杨升庵踪迹考》《升庵诗中的“滇海”地理意象探析》以及《杨慎的<文心雕龙>之学》为题，展开了杨升庵研究的

《魁阁时代》是一部以社会学学者群为描述对象的话剧作品，如果仅限于此的话，它也只不过是一部小众作品，但是事实表明，《魁阁时代》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因社会学人亦属于知识分子人群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学学者群体日思夜想的重大学命，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同样关切的重大学命，因此，费孝通等人的对话、思考、辩难、实践，这些行动也同时触动乃至启悟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抗战混乱中虽居陋室却由此更能体会生命苦难和民族危亡的魁阁学人群体，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心灵及人格的一部分。正基于此，《魁阁时代》足以走出社会学的学术圈，进入中国知识界的人格场。

三、对于“人”本身的人格强化。如同费孝通关注的是完整且立体的乡土中国一般，《魁阁时代》的关注对象也是完整而立体的，它不仅限于社会学人群体，也不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正如剧中还为我们展示了官、绅、民、匪等不同身份，其本质是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社会模型，包含了总体意义上的“人”的总和，从而形构了“社会”。现代中国的道路要靠谁走？构建未来的探索要靠谁来实现？仅靠学人群体是不够的，究其根本来说，传统中国的“士志于道”终究是少数人的特权（尽管表现为责任与担当，但在根本上是不平等的），而要走出真正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则要靠整个社会的群体性力量，于是这就引向了更大范围的群体人格——即“人”本身的集体人格强化，学术传承、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最终是落实到群体的多数人，而非个体的少数人。从这一点看，《魁阁时代》具备了启悟群体人格的艺术潜力。

三

《魁阁时代》是一部思辨剧，它思辨的不仅是专业建设和人格培养，还关涉着更为宏大的命题，即国家发展。有意思的是，《魁阁时代》并没有单纯为了歌颂费孝通以及社会学、从而只选择了一种国家发展的路径进行表述，剧中的“思辨”极具意蕴，思辨，意味着不同观念的讨论与交锋，而这些不同观念，就是不同角度的国家发展观。

首先，当然是以费孝通等人代表

20余名学者围绕杨慎的文学、诗学、书法、文献整理等与云南文化的关系等话题作了分享，让与会者充分感受到杨升庵研究的广度、厚度和深度。

诸葛声在《滇史》中曾经评价杨升庵到云南后的人文景象说：云南“英华并起，几埒中州”，杨升庵与云南文化的相互影响于兹可见一斑。在云南文化尚沉睡于中华西南边陲的岁月，杨升庵是一道掠过三迤大地的一道紫光，它惊醒了高原红土地上的文化之精灵，山水、人物、历史、图腾……而这一切丰赡、美丽、神奇的文化资源，又赋予了杨状元独标异帜的文化风流，并因之而传扬于九州大地，杨升庵与云南是一种伟大的相互成就，一幅雄浑且壮丽的文化织锦图！

学术主持人范建华、段炳昌、纳张元、董洋在研讨评议阶段总结道：杨升庵以及杨升庵研究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目前，全国的杨升庵系统研究已经起步，云南也已先后有一批学者认识到杨慎研究的重要性，但杨升庵整体研究与系统研究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重视杨慎的全方位价值的挖掘，尤其是对云南而言。本次研讨会的总策划张昌山教授最后对研讨会进行画龙点睛式的总结：这是一场致敬杨状元的盛会，老中青三代的八方来宾、专家为研讨会奉献了杨升庵研究的最新成果，云南的学者们也在盛会中展现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一场研讨会营造了杨慎研究的好氛围，开启了杨慎研究的新境界，这具有全国的意义，云南学者要不负历史使命，做大做强杨慎的相关研究。

3日，与会者携着“杨升庵”符号的遗韵走进西山高晓升庵祠，追寻那颗曾经照亮中国文化版图一隅的明星。据悉，“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今后将每年举行，这是彩云之南继弘杨“徐霞客与云南”文化后，又一项目有影响的文化新旅。杨慎即杨升庵是推动云南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符号，学术带动文化繁荣，推动旅游发展，这是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时代的新风尚——让杨升庵与云南在新时代灿发出熠熠光芒，我们拭目以待！

品藻录

我读《苦雾抄》

朱航潇

《苦雾抄》是止庵的第14本随笔集。他之前的13本集子，我都买来读过，且写过一篇《止庵文集识小》。当代作家中，止庵是我一直关注且喜欢的。我读他的第一本书是《六丑笔记》，记得是在南京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里借到的，当时只是觉得书名比较奇怪，写的内容也是我喜欢的话题。20多年过去了，我从他的一位读者，变成了与他相识的忘年交，他的书，也一直关注着。他曾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朋友介绍我与他认识，在三联书店附近，赠我一册《如画说》，另一本是我去他家中拜访，他赠我一册刚刚出版的《茶店说书》，还特别赠了一叶自印的藏书票。我后来编《中国随笔年选》，他是我遴选随笔最多的一位，总计大概有六七篇。有一年，他的著作《惜别》出版，我选了其中一章《母亲与读书》，有次在人民大学的一个新书讨论会上，他告知这篇并非全书最佳；由此他也多次推荐新作给我，其中便曾给我发来著作《画见》中的章节《画廊故事·女人（一到八）》，似乎那时候他还没有决定将这本文书名名为《画见》。他还发来过一篇《我的父亲和他的诗》，收在这本《苦雾抄》中。

《苦雾抄》首篇为《春夜讲唐诗记》，刊发在2020年《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我倾读之下，便是十分喜爱。当时新冠疫情肆虐，止庵在文章中说他宅在家中，晚饭后给人家讲解唐诗，每次选一家中的四五首，或绝句，或律诗，或古风。《春夜讲唐诗记》共选了5位，分别为王昌龄、贾岛、李贺、杜牧、陈陶，其中贾岛有两首诗，李贺有两首诗，每首诗谈一段，有点札记的意味，想来应该是从众多读诗笔记中摘选的。我非常喜欢他谈陈陶的《陇西行》，觉得意思很尖锐，似乎有暗讽的意味。他在文章中写道：“累累白骨散落在荒凉之地，‘春闺’也分布于天下各处，这正是此诗震撼人心的地方。”又写道：“哪些春闺梦是暖暖的、长长的，太阳升起犹迟迟未醒，同一个太阳也照耀着具具白骨，而这曾是一个个年轻、强壮、用‘貂锦’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将士。一具白骨，对应一位梦里人，一处春闺。”《苦雾抄》还有一篇随笔《我与树与花》，刊发在2021年《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发表时还配了他家院子里一棵紫薇的彩色照片。这篇文章我也拟选在年选中，但这个选本的项目突然终止了。当时颇有一种特别的遗憾。

《春夜讲唐诗记》近于随笔，写自己的随感与读诗的札记，并不一定周全，但一定有自己的独特的认识。《我与树与花》则应属于散文，叙写自己的故事，有着特别的生活体验。《在雪国重读〈雪国〉》，乃是他日本寻访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并在此重读的札记，也是很有意思的。《关于李长声》与《友人谈游记》等文章，大多属于这类随笔，写自己的对人与事的见识，多不流俗。而《我所见到的奈良》《夏目漱石的几处遗迹》《北京故事》《喝茶》等，则属于叙事散文了。《苦雾抄》中还有几篇，诸如《周作人与希腊神话》《周作人与汤尔》《张爱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等，接近于学术论文，写得十分周密，但文意娓娓道来，不觉得生硬。尤其是前两篇，乃是有新材料，亦有人见识，写得抽丝剥茧，颇见功力。止庵的诸多文集，每个集子都会收录几篇谈周作人与张爱玲的文章，这是他下功夫最深的两位作家，也最能体现他显得有分量的地方。之前写张爱玲的文章，已经汇编成了一册《讲张文字》，但这两篇并没有收录。他谈周作的文章，如果汇编成册，那一定是很厚的一本著作。

在《苦雾抄》中，也可看出止庵的写作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

《大画西藏》出版

著名油画家胡道昌主题画册《大画西藏》日前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书画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书法家沈鹏为画册题词。

这本主题画册一共收录了画家的210幅新作，表现了西藏自治区7市（地）、74县（区、市）的代表性景观景点，从巍峨壮丽的雪山奇峰到湛蓝的江河湖泊，从文物古迹建筑到藏民的幸福生活场景，画家通过自己独特的眼光和创作风格，系统、全面地展现和诠释了大美西藏的人文和自然风景，令人赏心悦目。

随笔，多介于文学评论与文学论文之间，诸如谈庄子、唐诗、周氏兄弟、张爱玲，以及他感兴趣的一些中外作家作品，后者大体以中国现代作家和西方现代经典作家为主；另一则是谈日本，上述《关于李长声》，谈的其实是“知日”这个问题，还有谈川端康成，以及他在日本参观作家故居的事情，这个爱好在他的日记体作品《游日记》中体现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则是谈北京，此书收录的《我怎样写〈受命〉》《北京故事》《喝茶》《生火》《我与树与花》等，都与北京有关的话题，也都与他的长篇小说《受命》相关。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故事，我很喜欢这部小说，说来很喜欢止庵在小说中营造的那种特别的氛围，读来很有种代入感。后来我想这与止庵的写作方式有关，他的小说写得也很像随笔，有些追求废名的小说《桃园》的意思。止庵还有一个爱好便是看电影和观影，前者似乎很少写过东西，记得只写过一组谈电影与文学原著的文章，收在他的随笔集《拾得者》中；后者则有一种随笔集，分别为《画廊故事》和《画见》。

在《苦雾抄》中，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止庵在文章中数次阐述的一个观点，便是对于信息泛滥时代写作者的思考。在《关于李长声》中，他这样写道：“如今在互联网上，信息的更新较之过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询也便利得多。对于一位作者来说，写作到底因此变得容易了，还是困难了；应该多写，还是少写；有些内容需要写，还是不必再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信息爆炸’之际，只有真正属于个人的声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种仅仅依仗语言优势的‘编译’，同样很容易被替代。”在《我怎样写〈画见〉》中，他亦写道：“从《画廊故事》到《画见》，差不多隔了20年，其间最大的改变是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网上轻松地就能获取信息，譬如画家的生平逸事，美术史上的相关介绍之类，照搬这些东西放进书里——不妨称为‘代人百度体’——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或者要说，这样也无效，总归有人懒得去查。对此我更难以置信，连网都懒得得上的人，怎么会有精力读你的书，而且还要花钱去买。所以，如果不写一己之见就根本没必要写书。”文章《与友人谈游记》中，也表达了类似的遗憾。

其实，在止庵的上一本文集《风月好谈》的序言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我刚开始写作时就就想：世上已有多篇文章，为什么还要再写呢，一篇写完或多或少总要道出他人之所未道，或大或小总得消除某个疑问。到了互联网时代又增添了新的想法：网上可以轻易查到的东西，为什么还白费力气写成文呢，有了Google或百度，我们应该写得更少才是。”由此，忽然想到止庵在文集《苦雾抄》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距前一本《风月好谈》出版已过了5年多，区区十万字竟写了这么久，甚矣吾衰矣。”当时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印象很深，若仅仅以随笔写作为例，这5年时间，他写得确是少了。后来想想，这便是典型的止庵式的自谦，乃至傲气。因为在这5年时间里，他写了一本随笔集《画见》，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受命》，还整理出版了一册《游日记》，再加上这册随笔集《苦雾抄》，不算其他编订的作品，成绩也算是不差了。待读了《苦雾抄》之后，觉得相比过去，他的写作内容更为丰富，类型更为多样，而态度也更为审慎和清醒，这倒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当今写作者一个启发。这也可能是我持续关注止庵的一个理由。

